

知识分子图书馆

Culture Studies Reader

文化研究读本

罗 钢 刘象愚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知识分子图书馆

文化研究读本

Culture Studies Reader

罗 钢 刘象愚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研究读本/罗钢,刘象愚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

(知识分子图书馆)

ISBN 7-5004-2734-4

I. 文… II. ①罗… ②刘… III. 文化-现象-研究 IV. 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1157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100720)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丰华装订厂装订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75 插页:2

字数:384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24.00 元

《知识分子图书馆》编委会

顾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主编：王逢振 J. 希利斯·米勒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J. 希利斯·米勒 王 宁 王逢振

白 焯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李自修

刘象愚 汪民安 张旭东 罗 钢

章国锋 谢少波

FFB/31

总 序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 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至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至30万字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

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么困难，也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赛义德等。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1996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赛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

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盛行不衰。

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

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斯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来理解其思辨的意义。

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鲜东西，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

们无需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

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烨、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

王逢振

1997.10. 于北京

前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

文化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看作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最富于变化，最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它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限，更没有人能为它提供一种确切的、普遍接受的定义。为了帮助本书的读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对它有一个大致的印象，我们不妨在与传统文学研究的对比当中，勾勒出它的一些基本倾向，当然这种勾勒只是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完整的理论概括。这些倾向是：1. 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历史经典不同，文化研究注重研究当代文化；2. 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3. 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亚文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4. 与传统文学研究将自身封闭在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研究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5. 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以上的描述是十分简略的，但即令通过这样一种极其简略的描述和比较，我们也可以发现，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的研究全然不同的、

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式。

从六十年代英国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倡导算起，文化研究在欧美已经经历了大约40多年的发展，目前许多欧美大学都建立了有关文化研究的系科，开设了文化研究的课程，文化研究在欧美学术体制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将对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和方法作一初步的介绍，为了使论述较为集中，我们将以介绍英国文化研究，尤其是著名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工作为主。

一、文化研究的起源

狭义的文化研究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英国逐步兴起，尔后扩展到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的一种学术思潮和知识传统。尽管霍尔声称，文化研究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开端”，但在追溯其根源时，大多数学者都把五六十年代之交出现的几部著作，如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1958)，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漫长的革命》(1961)，以及E. P. 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看作是它的奠基作。

理查德·约翰生指出，文化研究在政治和思想上各有其传统，在政治上，文化研究的产生与英国新左派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左派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而是五十年代末由一批前共产党知识分子（核心是一批党内历史学家），左翼文化人，以及激进的大学生结合而成的一种政治运动。新左派的目的是在英国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创造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五十年代末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如1956年英法入侵苏伊士运河，同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英国国内声势浩大的核裁军运动，推动他们走到一起。新左派的中坚力量是团结在《明理者》、《大学与左派评论》两个刊物周围的知识分子，前者的成员大多是

前英共党员，他们反对苏军入侵匈牙利，公开要求英共领导撤消对苏联侵略行径的支持，他们认为，无条件地接受苏共的政策实际上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历史方法，他们批判斯大林主义乃是基于抽象的教条而不是活生生的现实经验，认为斯大林主义的破产是由于其经济化约论，即把社会、政治、道德和艺术维度简单地化约为经济和阶级结构。他们批评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模式，要求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处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后者的成员主要是牛津大学的一批激进的大学生，其政治成分和态度更加复杂，但在倡导一种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上，他们和前者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正是这种一致促使两个刊物的成员走到一起，并于1959年合并为著名的《新左派评论》。新左派与文化研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许多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如威廉斯、汤普森、斯图亚特·霍尔等，同时又是新左派的核心成员。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新左派对文化政治的特殊重视，尤其是新左派在文化问题上的一些重要观点，例如，第一，对经济化约论的批判；第二，把文化看作社会过程本身，而把经济、政治仅仅看作这一过程的构成因素，都对后来文化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思想来源方面，文化研究可以上溯到英国文学批评家李维斯和以他为代表的“细绎”集团。五十年代，由于商业电视的普及，大众文化在英国迅速崛起，并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其实早在战前，以李维斯为首的一批文学批评家就已经开始对大众文化进行研究，如李维斯和丹尼·汤普生的《文化与环境》（1938）和Q. F. 李维斯的《小说与大众》（1932）便分别研究了广告和通俗小说。但令人遗憾的是，李维斯的历史观是保守的。对他来说，一种有机与和谐的社会秩序仅仅存在于十七世纪之前，它遭受到工业革命的破坏。李维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危机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所诊断的那样，存在于经济方面，而主要存在于精神和文化方

面。李维斯主张，为了拯救现代社会，必须恢复古老的有机社会的价值观念，而这需要借助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力量。站在这一立场，李维斯批评大众文化缺乏“道德的严肃性”和“审美价值”。文化研究的早期代表，如霍加特、威廉斯等在批评方法和文化观念上曾受到李维斯的影响，但在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上与李维斯等人却存在重大分歧，这种差异与两代批评家的出身和文化背景有关。李维斯等战前一代批评家大多出身于社会精英阶层，而在战后，由于经济重建的需要和福利国家带来的教育普及，许多出身于下层阶级的子弟也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威廉斯后来曾多次强调这种经验对于他们从事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这种经验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那些被排斥到边缘位置的非主流的社会集团，接触到为这些社会集团所熟悉的大众文化。

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发轫之作。它的写作意图与新左派理论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在自由主义知识界一个颇为流行的看法是，随着福利国家的建立，工人阶级正在逐渐中产阶级化，他们的生活条件、价值观念、文化趣味都日渐与中产阶级合流，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正在消失。而新左派则力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确认工人阶级的政治和文化身份，霍加特的著作可以看作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霍加特既不同意上述自由主义的观点，也不同意旧左派把工人阶级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僵化主张，他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既有连续性，又有变化性。这种变化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分辨出来。《文化的用途》一书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描绘了霍加特青年时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后一部分描述了五十年代美国式的大众娱乐文化对这种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的冲击。李维斯的影响在书中清晰可辨，霍加特提供给我们的是一幅李维斯式的历史文化景观，一种健康、淳朴的文化正在逐步被一种堕落、时髦的文化所取代。不过，与李维斯把十七世纪看作理想的有机社会不同，霍

加特心目中的“美好的旧时光”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在书中，霍加特充满同情，兴味盎然地描绘了这种文化，他以赞赏的口吻谈到在工人阶级读者中流行的通俗故事所表现的纯朴的感情：“这些故事描写的是一个有限的纯朴的世界，以几种公认并信奉已久的价值为基础，它往往是一个幼稚而华美的世界，感情的迸发形成巨大的热情，但这些感情迸发的确在起作用，这不是一个腐败或虚伪的世界。”^① 这些通俗故事“不是鼓励人们去逃避日常生活，而是强化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和兴趣”。^② 这可以看作霍加特对他青年时代工人阶级通俗文化的总体评价。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是自然、纯朴的，传统的工人阶级社区是一个有机的社会。霍加特在书中详尽地描写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各个侧面，工人聚集的小酒馆、工人俱乐部，工人中流行的期刊和故事，他们的体育活动、语言习惯与私生活、家庭和性别关系等。霍加特指出，在这各个方面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内在联系，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感受”，它的特征是集体价值和个人生活的紧密交织，这种内在的联系和共同感受使工人阶级文化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霍加特的著作具有浓厚的怀旧气息，他对战前工人阶级文化的赞美与对战后美国式大众文化的批判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缺乏有机性，缺乏在普通老百姓活生生的文化经验中牢固的根基，霍加特批评美国电视、流行音乐、犯罪小说等都是一种文化赝品。在《文化的用途》的后一部分，霍加特采用李维斯提供的术语，如“健康”“严肃”等来批评这种大众文化，并力图建立一种系统地鉴别大众文化的标准。这样，在霍加特的著作中我们便可以发现一种矛盾，一方面，他仍然沿用着英国精英文化所建立的价值尺

① 理查德·霍加特：《人民的“真实”世界：来自通俗艺术的例证——〈派格报〉》，本书第121页。

② 同上。

度和意识形态假定，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工人阶级通俗文化与其政治传统的统一性，这使他在书中常常从对通俗文化的社会功能的肯定不知不觉地滑向对其文本形式的批评，同时也使他忽略了大众文化自身的复杂性。

霍加特这部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对早期英国文化研究产生了三点影响。第一，《文化的用途》是一部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童年时代的经验和记忆。在我们眼前生动逼真地复活了那一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文化氛围，正如一个学者所说，该书的“强大的影响来源于这种自传，文学想像和批评感性的混合，读者依据一个置身于这种生活内部的人的视野看到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具体形象，并通过他亲炙了这种经验”。霍加特这种著述方式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中颇有特色的民族志传统。第二，霍加特曾接受过严格的文学训练，在书中他成功地把文学批评的方法应用于通俗文化，把流行音乐、通俗期刊等大众文化现象都作为一个个文本来加以分析，为早期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范例。第三，霍加特首次采用了跨学科的多维的视野，例如在书中他便同时采用了社会学、政治学与文学批评的视角。

尽管霍加特筌路蓝缕，功不可没，但对早期文化研究影响最大的应属雷蒙·威廉斯，正是威廉斯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等著作中，威廉斯明确地与那种传统的、超越功利的，仅仅局囿于精英文化范围的文化定义告别。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追溯了从工业革命直至当代“文化”一词的内涵所发生的变化，威廉斯同意李维斯的意见，传统的最精致的部分体现在语言和文学中，但他不同意李维斯的观点，全部文化遗产都是由语言和文学承载的。威廉斯认为，李维斯忽略了其它的知识形式、制度、风俗、习惯等等，夸大了文学的作用，威廉斯在书中写道：“对于文化这个概念，困难之处在于

我们必须不断扩展它的意义，直至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成为同义的。”^①

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对文化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他用“漫长的革命”来形容过去两百年间欧洲发生的工业革命、民主革命和文化变革。威廉斯摒弃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他认为民主革命和文化变革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自发的后果，而是社会整体进程的一部分。他说：“我们习惯了用政治和经济的术语来描绘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但作为一个经验的问题，人和社会并不局限于权力、财产和生产。他们对经验的描绘、学习、说服和交换的关系同样是基本的。”^②

在重视经验的基础上，威廉斯概括了文化的三种界定方式。第一种是理想的文化定义。这种定义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在这一项下文化是指我们称之为伟大传统的那些最优秀的思想和艺术经典。其次是文化的文献式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像作品的整体。第三种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正是这最后一种定义，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根据这种定义，文化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阐发某些伟大的思想和艺术作品，而是阐明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意義和价值，理解某一文化中“共同的重要因素”。文化的“社会”定义不仅涵盖了前两种定义，而且包括了被前两种定义排斥的，在很长时间内根本就不被承认是文化的众多内容，它们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方式等等”。^③ 威廉斯要求我们把文化过程看作一个整体。因此，对思想和艺术作品的文本分析应当和对它们

①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第256页，纽约，1978年。

② 雷蒙·威廉斯：《传播》，第10页，企鹅丛书，1976年。

③ 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本书第125、126页。

所从出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分析结合起来。对他而言，文化分析，就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①威廉斯的文化定义对于文化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为文化研究未来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正如霍尔所说：“它把论辩的全部基础从文学—道德的文化定义转变为一种人类学的文化意义，并把后者界定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意义和惯例都是社会地建构和历史地变化的，文学和艺术仅只是一种，尽管是受到特殊重视的社会传播形式。”^②

经验是威廉斯文化理论中一个核心的范畴。威廉斯认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其生活方式必然有一种独特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不可取代的。由于历史或地域的原因置身于这种文化之外，不具备这种经验的人，只能获得对这种文化的一种不完整或抽象的理解。这种为生活在同一种文化中的人们所共同拥有的经验，威廉斯称作“感觉结构”。他指出，所有的文化都拥有这种独特的生活感受，这种“独特和有个性的色彩”，“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期的文化”。^③

特纳指出，尽管威廉斯对所谓“感觉结构”并没有作出一个清晰的说明，但这个概念在英国文化研究中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要的是意识到一个时期的‘感觉结构’可能是与统治地位的文化观念相对立的，这样，尽管在连续不断的支配的文化结构内遭到贬斥，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仍然能够保存下来，威廉斯用这个范畴作为一种方式来坚持一种有机的平民精神的存在，这种精神是紧密地与具体的生活条件和价值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可能会也可

① 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本书第125、126页。

② 斯图亚特·霍尔等编：《文化 传媒 语言》，第19页，伦敦，1981年。

③ 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本书第132页。